

高长虹创作走向略述

高长虹自 1922 年 5 月 10 日发表处女作起至 1946 年 6 月 6 日发表压轴作止 24 年间就目前搜集到的作品计，共发表文章 1155 篇，133 万多字。其中诗 433 首 散文诗 89 首 散文 117 篇，杂文 461 篇 小说 25 篇 戏剧 8 篇 论文 22 篇。他出版过 17 个集子 其中诗集 5 个 散文诗集 1 个 散文集 1 个 杂文集 1 个，小说集 5 个 合集 4 个。

高长虹 24 年的创作历程 可以分为 5 个时期 太原时期、北京时期、上海时期、重庆时期、延安时期。前 3 个时期为他创作的前期 后 2 个时期则是他创作的后期。他出国近 8 年 本可作为一个创作时期进行研究，但寻到的作品只有一首诗，只好从略。

高长虹从事文学创作的意图 那就是：“把文艺界团结起来，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高长虹文集》下卷 511 页。以下只注卷别与页码）他的创作走向就十分清晰 对阻碍祖国繁荣进步的一切旧制度、旧势力、旧意识、旧习俗的抗争和对祖国繁荣进步所需的一切新知识、新思想、新主义、新制度的追求。他抗争与追求的决心始终坚定不移 不屈不挠；而他抗争与追求的基本轨迹是从朦胧到清晰。

一、太原时期

1922 年 5 月至 1924 年 9 月，是高长虹创作生涯的太原时期 历时 2 年 4 个月。这时期高长虹的创作以诗为主，共发表作品 141 篇 其中诗 138 篇 散文诗 2 首 杂文 1 则。

此时的高长虹 刚刚走出家庭步入社会 家庭束缚的余愠尚在，因而他的抗争与追求便是从家庭开始步入社会的。家庭，是高长虹与‘现实的黑暗势力作战’的第一个战场 他在这里觉醒，认清了旧家庭是维系旧社会生命基础的本质；他也是从这里杀出 杀向旧社会 杀向旧世界 杀向一切黑暗势力。高长虹 1922 年 5 月 10 日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处女作《红叶》以及 1923 年以《家庭之下》为总题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 6 首短诗 就是以对旧家庭的抗争为内容的。

《红叶》(下 1)两节 20 行：

路上一片红叶，
吞着声儿在这里哭泣。
她本是她母亲的爱子，
当那一阵无情的风儿，
吹在这天涯海国。
吹得下来，
吹不上去，
她只得伏在那里任人践踏；
狗过来舔一嘴，
驴过来尿一泡，
人过来踩一脚。

遥想她的小兄弟们
围着她母亲的脖儿还正在笑乐，
她不由得吞着声儿哭泣。
血泪儿流过了全身，
越添了十分的醉人的颜色。

我从山路上走过，
看见这一片可怜的红叶，
我拾起来插在胸前，
象朵玫瑰花一般的爱惜。

旧家庭与新青年之间一个突出的矛盾，是母爱亲情与传统势力束缚之间的冲突。高长虹与许多进步青年一样，也有强烈的母爱亲情，然而当他明白要得到母爱亲情必须以牺牲他对真理与光明的追求为代价时，他宁肯与家庭决裂。即便因此而异常痛苦，常常表现出怀恋母爱亲情与憎恶旧家庭的矛盾心情，然而他与旧家庭决绝的决心始终没有动摇。

《红叶》反映的，正是与家庭决绝中这种痛苦矛盾的心情。《红叶》中的“她”被“无情的风儿”从母亲的怀里吹落到地下而“任人践踏”；她“怀恋着依然围着母亲欢笑的兄弟们”，始终“吞着声儿哭泣”。然而“她”因挣脱了旧的束缚，不仅“添了十分醉人的颜色”，还被人拾起插在胸前，得到了“玫瑰花一般的爱惜”，终于实现了“她”的社会价值。

高长虹对家庭抗争是多方面的，有对两代人观念无法沟通的“代沟”的诉说，有对锁住青年手脚的“槛”的指控，而他反映最集中的是婚姻问题。家庭，以婚姻为纽带连结起来，反映家庭问

题，离不开这个核心题材。在婚姻问题上，高长虹受旧家庭之害最多，他对这个问题也就最敏感。

高长虹《家庭之下》6首诗中的《一刹那的回忆》(上 292)很值得一提，这首诗只有 7 行：

你的眼，卑怯如小羊，
你的手，娇弱如白莲，
你的脚步，如蝴蝶临风而翩跹，
从你那如水呜咽的音波里，
我听出你说不出的幽怨。
我读尽你全篇的历史，
在我初见你的那一瞥时间。

这首诗揭示的，是封建礼教毒害和封建婚姻制度约束下被扭曲了的妇女形象。作家避开浅露，把他的笔锋狠狠地刺向封建礼教的中心，去剖析造成这种外表美丽而精神创伤深重的形象的深层原因。诗中“卑怯”两个字极其准确巧妙形象。封建婚姻制度和婚姻观念对人尤其女人的摧残，主要表现在对她们的精神污染上，使她们对封建礼教心甘情愿地顺从或无可奈何地屈从。作者正是抓住这一本质特征来构架他的作品和塑造他的人物。他把“卑怯”二字放在首行，作为“眼”和“纲”以提携全篇。“卑怯”的眼神，正是封建礼教的毒害和封建制度压制的折光。明明是苦果，因为“卑怯”也必须去吞咽。

对于这颗苦果，女主人公也许还没有麻木到以苦为甜的地步，她也有怨，然而那怨是“幽怨”，而且是“说不出的幽怨”。她会“怨”谁呢？充其量，只能去“怨”那个永远也找不到头绪的“命”。

因而这“幽怨”也成了这首诗的“眼”。

“卑怯”加“幽怨”铸就了女主人公“全篇的历史”，使她不敢反抗，使她不知道去怨谁，只能糊里糊涂地受封建礼教的愚弄。这是一个多么震撼人心的悲剧形象啊！刚刚步入诗坛的高长虹，就以这样高品味的作品献给读者，显示了他的诗才与社会责任心。

1924年，高长虹发表在太原《狂飙月刊》上的4组长诗是他离开家庭小天地，步入社会大舞台之后，对生活的新的认识和新的追求。

高长虹诗歌创作中大部分是情诗，表面上看他是在追求爱情，歌颂美女，实质上他是在赞美人世间美好的事物和追求理想中的社会。在《美的颂歌》中，他颂扬了一位集外貌美、心灵美和力量美于一身的完美的美人，这种理想化了的高标准的美的形象，是诗人在“投身世界战”而“无援又孤军”时，寻求的精神支撑，以收“彼美在我傍，若拥百万众”的奇效。《恒山心影》所表现的，则是诗人追求美的执著精神。32行的诗，他竟用了24个“君”字，几乎行行见“君”，不厌其烦地反复渲染他对“君”难舍难离的深挚感情，淋漓尽致地宣泄了他对美的追求的百折不回的心绪。《美的憧憬》取另一个视角，即表现美的追求的艰难与曲折。追求有成，是企望中的收获，即使无功而返，也是预料中事，表明了诗人头脑的清醒。更可贵者，作者在追求过程中不仅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而且提高追求的群体意识。追求是一项群体活动，仅靠个人的努力是不行的：“我生渺小，如叶在树，不有好群，何能独愉。”（上38）

对美追求的执著，表现的最淋漓尽致的，要算《离魂曲》了。这首发表在1924年11月1日太原《狂飙月刊》上的400行长

诗已经不像《美的憧憬》那样把美当作理想化的可望不可即的“佳人”而是一位“溺彼现实之浊流”中的不幸者。这表现了诗人一种新的着眼点；对祖国的羸弱和人民的贫困的同情以及改变这种状况的愿望。诗中处处表现出历尽千辛万苦，不惜流血牺牲，誓与恶势力抗争到底，拯救生民于水火的决心：“吾将溅血成洪流兮，同众魔而永沉；吾将横尸作虹桥兮，渡生民于乐欣”（上 15）

高长虹这时期的作品，不论是抗争还是追求，均呈现着一种朦胧状态。这是诗人涉世未深的必然结果。他还缺乏成功与失败的人生体验，他还在理想的天地里经营他的创作事业。他对旧社会抗争的坚定性是不容置疑的，但在某些领域里他还分不清是非。他受和平主义的影响，对阶级斗争学说还不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十月革命还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因而他这只从封建势力“槛”中挣脱出来的“狼”，不知向哪里反扑，只能发出“苍凉而悲壮”的“哀鸣”。追求的坚定性并不能代替追求的明确性，他还寻求不到摆脱祖国贫穷落后的正确道路。他甚至还把无政府主义误认为真理：“安那其之美备兮，乃超人之所居。吾在群彦之中兮，忝滥竽而充数。”（上 21）

二、北京时期

1924年10月至1926年4月，是高长虹创作生涯的北京时期，历时1年半。这时期高长虹的创作日臻成熟，其特点一是数量大，共发表作品285篇，其中诗157首，散文诗45首，散文35篇，杂文39篇，小说4篇，戏剧4篇。出版集子3个，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和《闪光》合集《心的探险》。二是品种多，除诗歌外，当时文坛上运用的文学体裁几乎都使用了，而且都运用自

如，表现了他多方面的文学才能。三是质量高：他向社会推出了诗《闪光》、散文诗《幻想与作梦》和《创伤》、散文《土仪》和《花园之外》、杂文《弦上》等一系列得到社会赞许的精品。北京时期是高长虹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高潮期。

高长虹这时期的创作，继续沿着他的创作走向——抗争与追求发展。抗争的锋芒更加锐利，追求的决心亦愈坚定，抗争与追求的目标逐步明朗。

此时的高长虹已步入社会 4 年，生活阅历的增加，使他对社会的腐朽性有了更加深切的体验。他抗争的锋芒已从家庭转向社会。家庭只不过是社会的细胞而整个社会的活动机制才是万恶之源。他在《致雨农》中说：“社会同我们已处于势不两立的境地，社会不容我们存在，我们也在一息不忘地要把它置于死地。”（下 18）他在《游离》中更加义愤地喊道：“这世界是什么劳什子，打碎它啊！”（中 320）他的系列散文《创伤》中有一篇题为《市场》的文章，对旧社会的腐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辛辣的讽刺。作者把象征旧社会的“市场”放到一具女尸上，一切活动都在腐烂着的女尸上进行：“在这腐烂的，为不可统计的足的践踏所致而发着奇臭的尸体上，设立着茶馆、酒馆、杂货店，消渴的，昏醉的，无处归落的人们，每天整千整万地颠簸了来，便都化成了臭水，被吞没在尸体的溶解中。”（中 103）“尸体上颠倒着无聊的人们，以及这些人们习惯了而自以为香的奇臭。”（中 103）这就把旧社会口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表面上繁华热闹实际上腐朽霉烂的本质揭露了个痛快淋漓。

抗争意识的增强，是此期高长虹创作的另一特色。他的系列杂文《弦上》便是射向旧世界的支支箭镞。他在《序言》中说：“我把这支箭射中你的心窝，不偏不倚，从你的正中，迸出鲜红的

血来！”(上 194)在《给反抗者》中他问道：“有敢以一人而敌全世界的吗 有在百败之后 而仍欢快地去赴最后的绝地的吗？”(上 198)

1925 年夏 陆续发表在《京报副刊》上的长诗《闪光》更是一曲抗争的交响乐，其中荡漾着战斗的闪光，生命的闪光，血的闪光。面对横在面前有如“屠户的刀”的敌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揪住狮子的鬃毛”以死相搏。敌人是凶恶的 战斗将异常残酷激烈，战士们不免要抛头颅洒热血，然而战士将毫不犹豫地“献出他们的血来”。搏斗中 成败胜负难于预料 即便失败了，“当战士们都死了的时候”当“战场便恢复了原来的荒凉”的时候 又有什么了不起 那“荒凉”中不是透出一股悲壮之气吗 战士们将把失败的悲哀融在狂风里，“号着 号着 它响遍了大地”；他们的尸身被埋在荒原上，“开垦者来时 青春之麦啊 那都是我的化生！”(上 62)复活了的战士们，将会重新拿起武器冲向敌人，燃起更加激烈的战斗之火 血将要在新的战场上抛洒 当“黑暗中 现出点点红的血迹时 人类便要复活了！”(上 46)最后的胜利将属于不屈的人们。

抗争目标的明朗，是高长虹此期作品明显的变化。不论政治视野还是思想领域，他的敌我界限是非界限都在逐步清明。他在《反应》中说：“我觉得因袭思想是坏的 特殊阶级是坏的 这些在人类的进步上有极大的阻力，我于是攻击起他们来了。”(上 181)

高长虹很注重因袭思想，即旧传统观念与习惯势力对人们的影响与毒害。精神的腐败是一个民族的致命伤。1925 年前后，正当帝制虽崩 民主未立 军阀混战 列强趁火 祖国危殆 民不聊生之际，与千千万万爱国志士相反，一些在因袭思想影响下的

民族劣根性纷纷亮相 表演了各种丑态。他在《反应》中忧心忡忡地说：“中国的腐败 是腐败在国民精神上 不把这内部的腐败弄出来，一切新的东西都会变了颜色。”（上 183）

高长虹指责的因袭思想是些什么呢？其中之一便是“奴心”和“心死”。他在《狂飙之歌》中写道：“看你枯黄的病容 看你瘠瘦的柴身，你们所患的不是外来的强力，而是你们自备的奴心。”（下 28）他又说：“他在有进无退的征服的路上 有时也不免低头垂泪 但他不在悲悼他被误解的噩运 而在哭你们的心死。”（下 29）这种民族心理上对外卑躬屈膝，对内悲观失望的阴影，带给高长虹的悲怆是多么深重啊！“奴心”与“心死”的后果是悲惨的：“枷锁压在你们的肩上，监狱禁锢了你们的自由，而不知造枷建狱的 却正是你们自己的双手。”（下 30）

1925年夏，高长虹在《莽原》周刊上发表的系列杂文《弦上》，对因袭思想传染给人的坏毛病进行了尖锐的讽刺。高长虹揭示中国人好讲面子的危害性时，说：“中国就好讲面子的 为了这个面子的缘故，也不知道有多少好的事情被推诿过去，坏的事情被保持下来。”（上 200）在《我的命令》中，作者以讽刺画的手法，把摆阔气、装门面虚伪嘴脸，放在祖国危难的大背景下活现出来供人饱览，解说词写的是：“摆架子、装门面 处世之金针也。我今赠给你，一生吃着不尽矣。去吧，宝贝们 你们将要为世界增色不少！”（上 203）在《识时务者》中，高长虹抓住“识时务者 是为俊杰”这条古训，鞭笞了那些有奶便是娘的政治掮客的丑恶嘴脸，军阀兴时 他们奔走其门下；“拜门生 认干爹”民国得势 他们又“虾蟆蝌蚪”，没有一个不隶党籍；“袁世凯跋扈 他们相率‘劝进’ 皇帝梦破 他们又‘高揭倒袁之旗帜’去了”

对“特殊阶级”，高长虹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抗争精神。1926

年高长虹创建的《弦上》周刊，就是刺向北洋军阀及其帮凶们的支支利箭。它虽然弓小箭微，然而箭无虚发，把把中的，成了当时出版界敢于直面杀人不眨眼的野蛮统治者的强者。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弦上》动用三期九篇文章的火力，向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进行猛烈轰击。高长虹在《论三月十八》中写道：“惨案不是有力的反动，无足惊，无足畏，那只是死尸的回光反照。……地球上没有真正的敌人，只要看出他们死的机关，他立即便会成为死人。这是多么可笑的敌人呵！”（上 227—228）

高长虹之所以如此蔑视北洋军阀，除了他无畏的抗争精神外，更在于他对军阀这一社会现象本质的认识。他在《弦上》周刊上以10篇的篇幅论及军阀及其代理人。从袁世凯以下的黎元洪、曹锟、段祺瑞、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赵恒惕，都给予一针见血的贬斥。他指斥手握生杀大权的段祺瑞是“仰人鼻息，苟延残喘”的“傀儡”。他直呼另一个杀人魔王张作霖是“一彻头彻尾的草寇耳”。

如果说上述指斥是高长虹的无畏的话，下面的分析则是他对军阀阶级本质的认识。他说：“张作霖的思想也只是旧土人阶级的代表思想”，他说吴佩孚“在经济的生活上，也属于旧土人阶级”。

对北洋军阀总体认识上，高长虹表现了一种居高临下，一览无余的气势。他在《街谈巷议第一章》中，对军阀的兴起作了扼要的概括：“军阀之兴，肇端于曾国藩，代嬗于李鸿章，而形成于袁世凯。”（下104）他在《妻子及其它》中，对军阀的描绘令人叫绝：“军阀是一些被动的东西，他们被历史、制度、潮流夹攻着而辨不出方向，他们没有自觉没有时代，他们互相碰冲而无所谓爱憎，

他们所想占据的东西是实际上并没有的东西，他们冲锋陷阵在他们的梦里 他们的全部历史便是 短期的纷扰与长期的灭亡。”

(上 230)

值得注意的是高长虹把当时以反军阀的革命者自居的国民党反动派 从胡汉民、孙科、汪精卫直到蒋介石 都统统列入军阀一流加以考察。对胡汉民、孙科之流的老右派，他似乎不屑一顾：“若夫胡汉民、孙科之流 久矣夫余欲无言。(下 105)对冒充左派的汪精卫，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他是一个“以暗杀始，以妥协终，可爱而可怜”的投机者。对当时反革命面目尚未暴露，在时人眼里还是“北伐英雄”的蒋介石，高长虹则老大不客气地称他为军阀当中的“雏形”。他在《反动时期》中暗示说：“虽然 现在有一军阀者，则似已具有此种雏形，待我且看他日后如何好了。”(下 91)到了《街谈巷议第一章》中 他便以调侃的笔调直指其人而言曰：“而蒋介石脱颖而出 挺立其上。将之人 诚国民有党以来第一人也 观其根深叶茂 曲径旁通 应付得宜 雷怒而莺诉 可歌可泣哉蒋介石也 然而 然而 天下大难 来日方长，一言而兴，一言而丧。余老矣 眼花矣 余待将看几场龙虎斗也！”(下 105)

北京时期，高长虹的追求也达到一个新的境地。他冲破娘子关的闭塞 跨入相对开放的北京 眼界开阔了 阅历增长了 在斗争实践的洗礼中，他逐渐地成熟起来了。

生命的追求，是高长虹从懂事起就开始了的。什么是生命的价值呢？他曾苦苦思索而不得，这时期才有了明确的答案。他在系列散文《创伤》的首题《沉没》中说：“什么是生命呢 生命是不断的努力 更高的享乐的追求 永无止境的向上。(上 93)他心目中的“更高享乐”不是金钱美女 不是欢乐安逸 而是与“毒龙”、“魔王”作殊死的斗争。

爱情的追求是高长虹追求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这种追求贯穿于他创作的始终。他追求的爱情，不是男欢女爱的卿卿我我也不是温馨的小家庭生活而是“尸首里复活了”的新生命的结晶是“让我们诵着恋爱的福音去超度被恶魔捉去了的人类”的承担着共同义务的结合。他在《血的帝国》中说：“爱的真理便是从灵魂里流出的血的互相酬赠。”（上 94）

在追求真理的主旋律中从“人道呀 人类的爱呀”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可笑的迷信”中解脱出来，也许是高长虹这时期追求的最大的收获吧！他在《反应》中说：“人类为什么喜欢造出一些没有的东西来欺骗自己、安慰自己呢？中国人造出了神，欧洲人造出了上帝，然而人永远没有看见过神或上帝。后世人们渐渐聪明了，知道那些是可笑的迷信，然而刚抛开了神或上帝，接着便又造出人类的爱呀，同情呀，人道呀种种变相的神或上帝去代替那原来的神或上帝。……那些不仍然是些没有的东西，不仍然是些可笑的迷信吗？如其人类能够相爱，真有同情，他们最初生下来时便该是那样，社会决不会闹着闹着，一直闹到现在。”（上 183）

高长虹认识到了思想有阶级性，是他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跃进。他正一步步的接近马克思主义。他在《反应》中说：“有好久的時候，我一点也不能够明白思想之有阶级性，但到近来，我觉得那是对了。”（上 181）

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同时，高长虹也逐渐远离着无政府主义。他在《反应》中说：“我不承认克鲁泡特金是一个平民革命者他到最后，还只是一个有平民思想的贵族。”（上 181）他在《三言两语》中又说：“但是安那其 我讨厌透了这几个字！”（下 86）

追求，尽管是不懈的，然而那只是一个从朦胧到清明的过

程。这时期，高长虹追求的朦胧还是很明显的。当他向“特殊阶级”和“因袭思想”出击时，同营垒中却有人骂他“刻毒”和“目空一切”。他茫然地问：“究竟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呢？”（《上 181》）茫然中，他不知所措地四面出击：“反抗呵，反抗一切权威！”（《闪光》上 52）他还不得不把他的追求蒙上一层梦境和幻想的面纱。现实中寻求不到时，只好到梦幻中去寻觅。他在《恶梦》中说：“我在梦中，比醒时看见了更真实的世界。”（《上 82》）梦幻中的美，虽然短暂，倒也不失为一种慰藉：“让我们作梦去吧，让我们在那无休止的丑和痛苦中，偷空儿找那一刹那的美和快乐去吧！”（《恶梦》上 82）然而，梦幻中的美终代替不了现实中的丑，梦多时往往美梦都变成了恶梦：“我在梦中，一切都是恶，都是丑，都是虚伪。”（《恶梦》上 82）其结果是梦幻于他的追求没有任何帮助。他在《幻想与作梦》中说：“每到无可如何时候的我，常有从梦中得到满意的解决的把握，但现在，连梦都不能够帮助我了。它所给予我的，并没有超于无可如何者。”（《上 72》）

三、上海时期

1926年5月至1930年初，是高长虹创作生涯的上海时期，历时3年半。这时期是高长虹创作的鼎盛阶段，共发表作品612篇，其中诗84首，散文诗42首，散文82篇，杂文368篇，小说21篇，戏剧3篇，论文12篇。出版集子13个，诗集《给——》和《献给自然的女儿》，散文诗集《草书纪年》，散文集《曙》，杂文集《走到出版界》，小说集《春天的人们》、《实生活》、《青白》、《游离》和《神仙世界》，合集《光与热》、《时代的先驱》和《从荒岛到莽原》。

上海时期，高长虹的创作走向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由只重艺术创作向艺术创作与科学研究并重的走向转折。这种转折源于他对国内政治形势的认识。1926年下半年，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祖国统一在即。统一后的祖国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于是他决心将主要精力用于科学研究，而以经济研究为主。

其二，由只重感情抒发向感情抒发与思想阐述并重的走向转折。高长虹这时期的创作更看重社会参与而不事美学追求，因而他的创作在文字上是只重述说而不事雕琢；体裁上他擅长的诗、散文诗、散文日少而便于有感而发的杂文大增。他的杂文直抒胸臆，有感而发，选材随意，文字粗疏，较北京时期的杂文文采逊色多了。然而，就在这些随感式的文字海洋里，却蕴藏着闪烁了思想光辉的玑珠。他的思想虽不系统不全面，却有独到的见识与深邃的眼力。这时期的杂文，思想成就大于艺术成就。高长虹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思想家。

其三，由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向社会主义立场的走向转折。高长虹这时期的抗争与追求，都进入一个新天地。抗争与追求的目标已很明朗，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已经形成，并开始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转变。

上海时期高长虹抗争的深入在于他已经从“究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茫然中走了出来，他已经不再呼喊着“反抗一切”的口号四面出击，他已经知道了去反对谁。

这个时期，高长虹完成了他对无政府主义从欣赏到怀疑到否定的全过程。他已经在政治和哲学的高度认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本来面目。他在系列杂文《走到出版界》中表达了他的看法。他在1926年11月28日的《思想上的新青年时期》(中175)中，指出了无政府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根本上反对政治”。同年12

月 5 日的《靳云鹏先生的说话》中，高长虹从哲学的角度给了无政府主义以致命的一击：“克鲁泡特金的学说 他的解释 他的方法是科学的，然而他的基本思想是玄学的，所以也终是空想。”（中 182）高长虹一旦揭开了无政府主义美丽而虚伪的面纱，便毅然与之决裂了。这是高长虹一生的一个重大的转折。

在打倒封建主义之后，中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区别一个人旧民主主义立场还是新民主主义立场的分水岭。高长虹在 1927 年 9 至 10 月间写的系列散文《曙》中，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态度。他认为旧中国走不通资本主义道路。他说：“现在的商人们都好像在睁大了眼睛只想吃人 如何能做得开创业者呢！商人们都向着资本家那一条道上走，而现在的经济事实又不准他们去做资本家，所以只得去做成一个旧式的老板。”（上 506）既然中国走不通资本主义道路，高长虹就明确提出了“打倒资本家 收回自然 收回科学！”（上 459）的口号。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走什么道路呢？他提出了走合作化道路的设想。他说：“中国经济的趋势是很好的 既不容纳资本家存在 当然都将变成合作者了。”（上 506）这时期，高长虹提出的科学为劳动者占有的主张，是他向社会主义立场转折的最明显的信号。他在《建设在民间》中说：“又使生产科学化 如何而能不养成新资产阶级 这又必须科学为劳动者所占有。”（中 241）

高长虹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时期完成的。他在《走到出版界》、《曙》和《每日评论》中都涉及这个题目。对帝国主义的本质 他在《曙》中有形象的比喻：“我小的时候 常听祖母讲毛鬼神的故事。它想叫谁家穷的时候，它便把那家的财产偷偷的搬运了去。后来我知道毛鬼神是没有的了，但是我也知道了那帝国主义倒同毛鬼神很相像呢！”（上 509）到 1928 年的《每日评论》中，

便是逻辑的分析了：“欧洲各国，……实业革命后，不幸而帝国主义起来了，内而压迫本国的劳动者，外而压迫别的贫穷的民族。这诚然是欧洲经济史上，也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大变动。中国也正是在这种大变动之下受了牺牲的民族之一。”（下 145）

对帝国主义产生后的国际形势，高长虹有深刻的分析。他在《曙》中说：“洋货从吴淞口进来，一个僻野的村乡里生活便要起相当的变化。帝国主义使人们穷，穷人们又当兵去打倒帝国主义，这还不仍然是一致的吗？”（上 509）在《黄祸与酋长思想》中，他尖锐地提出：“现代世界的冲突，已不是黄白的冲突，而是无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冲突，而是帝国主义互相的冲突。”（中 249）

压迫贫穷的民族，中国首当其冲。中国人民如何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呢？高长虹主张要建设科学，增强国力。他在《建设在民间》中说：“反抗帝国主义自然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是，如何才能反抗得了帝国主义？这个第一件重要的工作是必须生产的科学化。”（中 241）在《建设科学》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帝国主义是因为科学应用到经济上而起来的，如想打倒帝国主义，仍然得在经济上建设科学。中国如有科学，帝国主义不打而自倒，如没有科学，虽想打倒帝国主义而经济没有打倒的能力。”（下 145）

在抗争帝国主义的斗争中，高长虹一向以身相许。他在《曙》中说：“我只愿做一个军人，做一个征服帝国主义的军人！”（上 492）一旦中国富强起来之后，高长虹断然拒绝中国走帝国主义的老路。他在《曙》中说：“中国人不愿意这样。中国人所追求的，不是少数人的富足，而是民族的富足。不是一国的富足，而是全人类的富足。”（上 145）

创作走向的转折，规定着高长虹追求的两个主旨：科学的追

求和革命的追求。

高长虹的科学追求，在于他追求科学救国的途径。在 1926 年 11 月 18 日《晴天的话》中他就表明了自己要建设科学的决心。他说：“提倡了好久的科学 我们现在才开始抱着牺牲的精神去建设。我们希望同时代的人给与我们帮助，或给与我们指谪，但不希望给与我们敌视。（中 190）他爱科学 因为‘科学同样是爱的产物 不爱真理 不爱宇宙 哪里会有科学呢！（中 245）”

1927 年秋 高长虹在西湖写他的《曙》的时候 就对中国的缺乏科学而忧心忡忡 他说：“没有科学 没有充分的劳动，一个民族便要衰颓而且灭亡！（上 483）1928 年 10 月他办个人刊物《长虹周刊》时 科学是主要内容之一。他在《征求科学的朋友》中说：“有科学 中国便有救 没有科学 中国便没救。当然 这里所说的科学包含经济的科学在内。我以救中国为我的责任吧！现在的和未来的科学的朋友们，我们以救中国为我们的责任吧！”（下 304）

对中国科学的现状和前途，高长虹的估计是乐观而充满信心的。他在《科学上的黄金时代》中说：“艺术的黄金时代已经到了。在这十年内的中国艺术，无疑地将为世界艺术的主潮。然而科学在中国，还须十年的启蒙期。……我敢保证，十年后的中国确乎已是科学上的黄金时代的中国了。（下 308）”

高长虹以科学救国为宗旨，以研究科学为己任，1926 年秋在上海创办《狂飙》周刊 就开始了创立科学的事业。他广交科学研究界的朋友 把《狂飙》周刊做为狂飙社开展科学研究的基地。他自己也在“研究着天文学、数学、物理学” 他还想“进实验室去” 他还想“办一个科学丛书” 以便“第一 供给科学的读物 第二，补助科学的研究者的学费；第三，联合科学家来共同工作”。